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1-103-05

考据癖:宋词小序产生发展的原因之一

张晓宁

(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中国文化中的“考据癖”是宋词小序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受众方面的“考据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追索本事的欲望,词序是本事最好的载体和受众求奇索隐的欲望的最直接的触发点。作者方面的“考据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叙事愿望,词序正好满足了作者阐释自己的叙事需求。词序的产生与发展是受众与作者的“考据癖”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考据癖;求真尚实;本事;叙事需求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1.016

从《全宋词》的检索来看,宋初的词并无题序,从陈亚开始有了简短的题,从张先开始有了简短的序,受张先影响很深的苏轼开始在词中大量地使用小序。苏轼之后,用小序的词人越来越多,其艺术水准也日益提高,并且有篇幅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丰富,风格越来越多样的趋势。

词序这种特殊的文体何以会产生,何以会不断发展壮大,直至与词本文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其原因值得探讨。前人的意见不外乎受诗序的文体横向影响,调名脱离本意,不得不另加题序点明主旨等等。词序产生发展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其中牵涉的因素也绝非一种,笔者以为,除了前人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还当与中国文化中的“考据癖”有关。

钱钟书《围城》当中,诗人曹元朗说:“你们弄中国文学的,全有这个‘考据癖’的坏习气。”^{[1](P81)}“考据”一词,《辞海》释义:“考据:也叫‘考证’。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2](P2831)}考据的范围与内容主要有二:一是考订古书;二是考证史事。所谓考订古书,主要是指

考证古书的作者、年代、和发展的深刻影响。

(一)受众方面的“考据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追索本事的欲望

“本事”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很有特色的概念,指的是与文学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作家生平有关的轶闻趣事。此词最早出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3](P1715)}左丘明担忧由于《春秋》叙事简略,弟子们理解传播有误,所以根据本事而作《左传》。由此也可以推断,词本事就是用来记录词人生平及作词时的事实文字。

词本事在词的发展史上的地位绝对不容忽视。中国最早的词话著作是宋代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专门收录词作本事。这其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暗示——“本事”是中国传统词话的最原始最重要的形式。历代词话,考索起来,大多都是词本事的汇集。在历代的笔记小说中,这种记录本事之作亦比比皆是。如周密《武林旧事》记载陆游《钗头

收稿日期:2018-09-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唐宋词籍序跋研究”(项目编号:18XJA751002)。

作者简介:张晓宁(1977-),女,陕西眉县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风》本事,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本事,都给文学史增添了许多瑰丽的色彩。相似于《本事集》的书后代还有不少,如清代叶申芑的《本事词》,以及清代《词林纪事》《词苑丛谈》中的“纪事门”、《词苑粹编》“纪事”部分。直至今日,唐圭璋先生还拾阙搜遗,编成《宋词纪事》一书。

在词的接受史上,本事成为词诠释和经典化的一个重要辅助因素,一首词的背后若有一个惹人遐思或令人伤感的故事,往往读者理解更加深刻,传播也更快更久。时日久远之后,追索本事的意义又被迫加了一层:如果能够发现、勘误连当时人都遗佚或误记的本事,对后人来说精神上是一个多大的满足!所以总有人孜孜以求,远隔数代疑古勘误。如周邦彦《少年游》本事,流传数代,到了近代却被郑文焯、王国维和罗忼烈证据确凿地强烈怀疑起来。

董乃斌《现代小说观念与中国古典小说》中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叙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可以分为四层:含事、咏事、述事、演事。他说:“追索隐藏于‘含事’、‘咏事’之作背后的事实,实乃文学生活中的普遍而顽强的需求。”^{[4](P103)}词因为体制短小,又属于抒情文体,所以其中叙事大多是含事、咏事,因此词往往需要有辅助文本方能解索得清楚。索隐钩沉是我们文化血液中的爱好,探索别人的生活和情感本来就是人类深藏于心的欲望。所谓“知人论世”,读了一首好诗好词,受众便急欲知道此情何所由来,此人何等人物。虽然早知道有所谓“忧来无方”,但心底仍执着的相信是某事某物直接触动了作者的情思,于是追本求原,必欲得之而后快,《红楼梦》索隐一派便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产生的。因而追索隐藏于抒情和议论背后的本事,便成为历代词家最热衷的一项事业。

(二) 词序是本事最好的载体和受众求奇索隐的欲望的最直接的触发点

词序中的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词本事的最初来源。其中有的以词序本身的面目广为流传,如苏轼的《洞仙歌》序:“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馀。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人无知此词

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5](P383)}这则负载了一个既有香艳色彩又有传奇性质的本事的词序,从一出现就广为流播,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甚至也许高于对词作本身的熟悉。

有一些词话和笔记中的本事,是根据词序改写而来的。如叶申芑《本事词》收录唐、五代、宋、辽、金、元词人本事204则,其中38则都是根据史料和词序自撰的。如《放翁词·玉蝴蝶》序云:“王中州席上作。”叶申芑便在《本事词》中改写为本事:“放翁在中州席上,赋《玉蝴蝶》云:‘倦客平生行处……’,其描写处,曲尽情态,令人诵之如见其声容焉。”^{[6](P2345)}

一些记载在笔记、词话或其他文献中的本事,通过词序得到了印证,并有相映成趣之妙。如辛弃疾《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题序为:“书江西造口壁。”罗大经《鹤林玉露》记此词本事:“其题江西造口词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裕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7](P12-13)}后人两相对照,读来颇多词外之趣。

一些词序还可以相互参证。如《全宋词》收录苏轼《醉落魄·述怀》一首,而黄庭坚亦有《醉落魄》一首并序,黄序云:“旧有醉醒醒醉一曲云:醉醒醒醉。凭君会取皆滋味。浓斟琥珀香浮蚁,一入愁肠,便有阳春意。须将席幕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兀兀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此曲亦有佳句,而多斧凿痕,又语高下不甚入律。或传是东坡语,非也。与‘蜗角虚名’、‘解下痴繇’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5](P510)}同时好友的词序也许能给词作归属一个有力的证据,也为后代读者展卷把玩,钩沉索隐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有一些作者在词序中犯了些知识上的错误,颇能够满足后人勘误的乐趣。如苏轼《如梦令》序云:“……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5](P400)}而吴梅《词学通论》考证此词牌有更早出处:“(白居易)《宴桃源》云:‘前度小花静院。不比寻常时见。见了又还休,愁却等闲分散。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鬓

乱。’按格直是《如梦令》。昔人以后唐庄宗所作为创,不知已始于白傅矣。”^{[8](P26)}勘正了苏轼所提供的词牌来源。又如黄庭坚《减字木兰花》序云:“丙子仲秋黔守席上,客有举岑嘉州中秋诗曰:‘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因戏作。”^{[5](P505)}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位讲究“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的大家把杜甫的名作归到岑参名下了。

从词序还可以窥知作者生平行迹。吴梅《词学通论》说:“学者作题(注:吴梅是不分题与序统称为题的),应从石帚、草窗……抚时感事,如与古人晤对。(清真梦窗,词题至简。平生事实,无从讨索,亦词家憾事。)而平生行谊,即可由此考见焉。”^{[8](P6)}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考证词人生平,也往往以词序作为系年纪事的参考。

总之词序往往能以简短的语言,成为欣赏者据以想象和考证的根据,成为他们“心知其意,微窥而知”(钱穆语)的线索。词作的艺术涵量和影响力也因此被无限放大。

也正因如此,在后代词评家那里,有题序的词作往往更多地被引用和分析。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后人哀集词话,侧重于词之本事。凡词调之下标有题、序者,都是词话编纂者感兴趣的。”^[9]在欣赏的过程中,接受者也往往对这类词印象更加深刻,理解更加到位,因此这些词在经典化的路上便走得更加顺利,如上举苏轼《洞仙歌》的例子,还有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的例子。

二

(一)作者方面的“考据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叙事愿望

大凡是一个人,只要对世界和人生尚未完全绝望,就不会主动做永远的沉默。人人都希望表达自己,使自己被理解,这也是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产生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考据癖”——求真尚实的精神,在词人身上表现为一种最大限度地阐释自己,表达自己,让真我被彻底理解的强烈的叙事愿望。

就传统来讲,词是一种篇制短小的抒情文学。在词还是“歌者之词”的时候,也就是说,五代宋初时候的词,其抒情只是抒一种普泛化的情感,文人

创作的时候也不过是出于一种风流自赏的心态,可以说是以游戏之作抒游戏之情,正像胡适说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作者的个性都不充分表现。”^{[10](P4)}写作目的只是为了在酒席宴上供歌女传唱取乐,是一种程式化的写作,而那作词的人和作词的心情则被埋在莺歌燕语之中,金杯玉钟之下。这时的作者往往会悔其少作,自扫其迹,因为此时的词,还不具有为作者喉舌的功用,也不具备标志作者性格的能力。

可是当词从“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当它严重到成为一种抒情诗,并且担当起了抒发作者深沉感喟的重任的时候,这样“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明显已经不合节拍了。那些以词作为自己个人化抒情工具的作者已经不能忍受自己的作品没有傲然置放的背景,没有心灵的颤动和开放,而只是合于市街流行的声调。如苏轼“乌台诗案”贬逐黄州之后曾在信中说:“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11](P752)}然而他又不是一个沉默的人,他说自己若心有所感,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11](P1698)},可见词这时几乎已成为他诉说需求的唯一载体。试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词人们怎么还能允许负载着自己的悲欢,承托着自己血泪的词被人莫名其妙地传唱而根本不曾理解或只是误解呢?他当然会希望更加明确地、详细地表达自己的个人感情,希望受众在唱和听或读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他创作时的情境与心境,希望在词作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希望词作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因此词人往往想尽办法使受众了解自己的创作初衷和背景,苏轼就曾经主动向杨绘提供自己词作的本事作为他《本事集》的素材。

于是,词这种文体日益被加上了这样的作用:它往往要成为作者抒情的利器和议论的口舌。然而没有一种抒情和议论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谓“忧来无方”也只是找不到情感表层原因时的武断认定。此时作者对于叙事——抒情和议论的支点的需求便显得格外急切。人们暴露自己的愿望从来都是强烈的,诉说是人与生俱来的需求,文学是这种诉说需求的集中体现,而叙事是诉说的基础和根本,叙事能力是人本质力量的一部分。但词

的叙事,正如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所说,是“片段的、细节的、跳跃的、留白的、诗意的、自叙的”^[9],因为篇幅与格律以及文体性质所限,词本身不太容易满足作者的叙事需求。因此以某种方式来强化词的叙事性就很重要了。

(二)词序正好满足了作者阐释自己的叙事需求

加上词序便是实现作者叙事需求的途径之一。正如张海鸥所说:“苏、黄不仅‘以议论为诗’,而且以议论为词,因此他们很需要用一段序文来交代写作缘起、背景等等,这是他们的词较多序文的主要缘故。”^[9]上引董乃斌《现代小说观念与中国古典小说》中说:“在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乐府诗中,历来就存在着叙事传统,许多诗人也曾试用各种方式(如除标题外,又为诗作加写小序)来加强作品的叙事成分,以便扩大和加深其作品的表现内容。”^[4]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中 also 说:“诗题与诗序的制作,正表明当时诗人对于自己创作的诗歌有一种自觉的传播与传世的意识,诗题与诗序正是诗人进行自我阐释的努力,目的是要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读者的理解,接受和欣赏。”^[12]施诸词中亦是。

以叙事交代写作背景,引导理解阅读,后来便成为人们对于词序作用的一个传统认知。如周济

在评论姜夔词序时说:“白石词序甚可观,苦与词复,若序其缘起,不犯词境,斯为两美已”^{[13](P13)},“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现,如同嚼蜡矣。词序序作词缘起,以此意词中未备也,今人论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许复沓,而津津于白石词序,一何可笑”^{[13](P9)}。这两句话后人颇有不同意见,许多人认为姜词序与词珠联璧合,相映成趣,不是嚼蜡。实际上周济正好表达了当时一般读者对词序的正常期待:在云吞雾绕的美(词文)上,加一些明确的引导性话语,点明写作时间、地点、缘由,好让我们遵此线索去理解。而姜夔词序却往往“乱以他词”,使急于追索本事的读者索隐无门,怨不得周济们要抱怨了。由此可见,词序若不按照常见做法以叙事方式尽量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会让读者失望和不安的。

任何一种文艺形式的成功都与作者的创作心理与受众的接受心理有关,在这二者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时,或者作者的创作实践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期待时,便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和承认。词序正好把这两方面的需求完美结合了,它能在张先、苏轼之后大放异彩,在词史上占据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正是受众与作者的“考据癖”——索隐追本的精神和言说务尽的心理一拍即合互相鼓励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 [1] 钱钟书.围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
- [2] 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 董乃斌.现代小说观念与中国古典小说[J].文学遗产,1994,(2).
- [5] 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6]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7] 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 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9] 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 [10] 胡适.胡适选唐宋词三百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 [11] 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2] 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J].文学遗产,1996,(5).
- [13]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Researching Addiction: One of the Reasons of the Starting and Development of Song Ci's Prefaces

Zhang Xiao-ning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y Science, Shaanxi, Xi'an, 710048)

Abstract: Researching addiction in Chinese culture is one of the reasons of the Starting and Development of Song Ci's Prefaces. Researching Addiction in receivers showed as a strong desire of find truths, Ci's Prefaces is the best vector of truth and trigger point of receivers' finding desire. Researching Addiction in writer showed as a strong narrative aspirations, Ci's prefaces meets the writer's desire. The Starting and Development of Song Ci's Prefaces is the result of common efforts of the receivers and writers' researching addiction

Key words: Researching addiction; Advocating true; truth; narrative aspirations

(责任编辑:庄暨军)